

历时六载，校记数万条，新版《曹禺全集》出版——

完整呈现“话剧人”曹禺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9月24日是曹禺诞辰113周年。当天，由北京出版集团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、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曹禺诞辰113周年座谈会暨《曹禺全集》首发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。《曹禺全集》收录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曹禺作品，共11卷，力争为广大读者原汁原味呈现曹禺作品全貌，为专业学者和话剧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近日，围绕全集编纂与曹禺的生平和贡献，本报记者对该书主编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进行了专访。

问：能否请您先谈谈曹禺的历史地位和全集编纂的目的？

答：曹禺成为中国现当代重要的文化人物，首先是因为他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《家》等话剧。这些剧作问世以来，长演不衰，有着恒久的生命力。在中国话剧史上，曹禺并不是开山人物，就代际来说，他大概属于第三代，成名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。但他出手不凡，一部《雷雨》轰动一时。小到中学剧社，远到日本剧团，都争相上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，一生没有离开过话剧。

郭沫若、老舍年长曹禺不少，在文艺界的资格、地位也高于曹禺。但人艺保留剧目中，曹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写于20世纪30年代，郭沫若的《蔡文姬》、老舍的《茶馆》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，前者早很多。因此，如果要举出一位剧作家或一部剧作来代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话剧的成就，肯定还是曹禺和他的作品。这些经典剧作，不仅舞台上反复搬演至今，作为文学文本，也有着长久的阅读魅力。另外，曹禺丰富的话剧实践经验激发了后世的大量研究成果，他本人的特殊经历留下的历史印迹，也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。基于此，提供一部质量上乘、可资信赖的《曹禺全集》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都是必要的。

问：您历时十多年主持编撰的《曹禺全集》，其文献工作得到学界高度评价，并获第二届“中国出版政府奖”。这次新版《曹禺全集》的编纂工作是如何组织的，该书整体上如何设计？有哪些亮点？

答：这次全集编纂，由曹禺之女万方授权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社议，邀请我主持这一工作。编纂团队由13位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组成，并由钱理群、方锡德担任顾问。我们的设想一是为广大读者提供尽可能齐全的曹禺作品；二是为学术界提供尽

可能可靠的版本、尽可能全面的校勘，夯实学术研究的文献基础；三是为话剧从业者提供足够丰富的曹禺剧本信息，给舞台实践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资料。

基于这样的目的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。首先，在目录学方面，《曹禺全集》除了尽最大可能收集作品，新增数百篇以前未入集的文章外，还为每个剧本撰写了“叙录”，说明文本的演变，并为各类文章编制索引。其次，在版本学方面，广泛收集曹禺生前各剧作不同版本，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。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。由于时代变迁和曹禺个人际遇的变化，他的早期剧作经过多次修改，甚至不乏大改，而且每次修改所依据的版本都不好确认，必须逐一比对，方能有序呈现。在校勘学方面，我们谨慎确定底本、通校本、参校本，《曹禺全集》校记达数万条，各剧本动辄勘二三种甚至五六种版本，有些改动过大的则被列为附录本。由于工作浩繁，使得《曹禺全集》历时6年之久才得以面世。相信这些遵循严格文献学原则的工作，能使《曹禺全集》经受住时间的检验。

问：《曹禺全集》能让我们在哪些方面增进对曹禺的了解？

答：《曹禺全集》大体分为剧本、文集、书信日记三大部分。曹禺以剧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，一般来说，读者最熟悉的是他创作的几部名剧。但通过《曹禺全集》可知，曹禺还有大量的改译剧本。他翻译西方名剧，不遵循一般的翻译原则，无“忠实”一说，而是进行大量改动，目的是为了将其搬上中国舞台。1978年，他发表了最后一个剧本《王昭君》，但此后他还大幅度修改了早期改译剧《镀金》，并再度发表。可以说，改译剧本一直伴随着曹禺的戏剧生涯，创作和改译构成了曹禺戏剧生涯的两个面向。

进一步了解曹禺生平会发现，在话剧艺术方面，他还是演员、导演、教师。只有将这些综合起来，才构成完整的“话剧人”曹禺，而不仅是“剧作家”曹禺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才能更清楚曹禺那些名剧的写作特点。相比之下，很多剧作家创作剧本，不大考虑舞台上的事，那是导演和演员的工作。而曹禺创作剧本，首先要草拟分幕表、绘制舞台设计图、撰写剧中人物小传等。他写剧本时，已经将导演、演员、美工等工作，全部纳入考虑范围，所以他的剧本才有那么多细致的规定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脑中先装了个舞台，然后再来创



《曹禺全集》首发式现场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

作。他的改译剧《争强》正好保存下演出本，其中就有剧场建筑图、舞台示意图等。他创作其他剧本，也可能事先有类似的文稿。基于此，我们的校勘工作尤其注意这方面，也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他的修改，因为对话剧导演搬演他的剧本，有参考价值。

我们还发现曹禺在修改台词时，用字比较随意，经常用通假字，一时想不起怎么写，甚至生造字。但他对字音的区别非常敏感，包括标点的使用，也极为用心。他清楚，剧本最终是通过舞台上演员口中的声音实现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设计“凡例”时，也注意了这一点，并体现在校勘中。

曹禺人生阅历丰富复杂，兼具作家、艺术家、文化管理者等多重身份，这些都反映在《曹禺全集》中。相信通过其中的文字，能让我们对曹禺的认识更加深入、全面、准确。

问：曹禺的几部剧常演常新，您认为具体原因是什么？

答：曹禺的几部名剧，尤其是《雷雨》《日出》，其实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版本变化过程。新中国成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初刊本，经过精心调整，基本成为定本，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曹禺选集》，作为茅盾主编“新文学选集”丛书的一种，收入的3部剧作，又经过非常剧烈的改动。1954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曹禺剧本选》则往回改了相当比重，但又增添了新的修改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曹禺在四川重新出版自己的剧本，再经过一轮修订。这些版本修改或大或小，其中的变动，除了一部分是技术性的以外，更多的涉及作品的立意。比如《雷雨》，曹禺最初是

要通过这个故事，表达宿命的主题，所有人都逃不过命运。但随后，基于朋友的批评，曹禺做了一些小改动，比如将鲁大海的身份从“工头”变为“工人”。再后来则被改造为斗争主题，鲁大海因为是工人，戏份被加重，而繁漪则或多或少被赋予反抗性别压迫的角色任务。这些都是曹禺亲自改写的，反映出曹禺观念上的变化，也可以说是曹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“本意”。但无论哪个版本，在其产生的时代，都能吸引观众，其中的关键是曹禺“懂戏”。剧本提供了饱满的情节和人物，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不同的演绎不会对话剧的艺术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，加之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、演员，不断演出实践诠释剧本内涵，就形成了常演常新的局面。

问：从文献角度看，围绕曹禺还有什么工作要做？《曹禺全集》的出版，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整理有哪些启示？

答：所有的文献工作都有历史阶段性，要经过很长时间，才会出现趋于稳定的最终本。古代的经部书籍，一直到清中期才出现相对而言的善本，而直到现在，还在拾遗补缺。曹禺作为现代作家，其全集编纂历时不长，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曹禺的某些文章，我们已经得到线索，但仍不能获取。至于非公开出版的书信，更是散落各处。可以想见，未来还会发现全集失收的函件。目前的《曹禺全集》，努力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完善。尤其是我们执行了比较规范的文献学标准，这对于目前中国现代文献的整理而言，非常罕见，或许能为其他书籍出版提供参考。

虚实相生的艺术

——读叶炜长篇小说《东进》

江飞

南乡村的自然文化、风土人情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者有意寻求乡土写作与战争叙事的有机融合，这种融合无疑合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点，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找到了二者的交叉点。

《东进》有两个主要特点：一是将抗战与剿匪并置，与之相应，作者设计了双线结构：主线是以八路军政委四喜等为主要人物，以八路军“东进”山东后展开的重要战斗为叙述主体；副线是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固土匪的斗争和团结，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武装力量。主线与副线交织并进，抗战与剿匪密切配合，使得小说的故事性更强，覆盖面更广，叙

述节奏也变化有序、张弛有度，有效增强了文本的传奇性、地域性、丰富性、可读性。

二是软硬兼施，虚实相生。叶炜曾说，“小说既是经验和知识的产物，更是虚构和想象的大成。”在我看来，经验和知识是实，靠的是作家的硬功夫；虚构和想象是虚，靠的是作家的软实力，好的小说家一定善于软硬兼施，好的小说一定是虚实相生。尤其是对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，更需要严格把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。按照美学家李泽厚的说法，“度”是“掌握分寸，恰到好处”，是“美”的基石。如何把控这个“度”，既是对小说家写作技能的考验，更是

对其审美水平的考验。真正做到“大事不虚、小节不拘”不容易，作者在主线部分基本按照大事不虚的原则，贴近史实，力求还原，在副线部分基本按照小节不拘的原则，贴近生活，合理想象，把革命战争史和人物的生命史、情感史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在虚实相生中，塑造出谷四喜、白雪、刘玉胜、刘本功、刘黑棋、赵一味、赵灵芝等身份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。

毋庸讳言，或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囿于史实，从而导致了主线部分对谷四喜的塑造稍显平淡和扁平，反倒是副线部分对刘玉胜、赵一味的书写，生动、鲜活、可读性强。比如第一章刘玉胜“斗鹤鹑”、第三章赵一味“走抱犊”、第九章赵一味挖“野人参”等。希望作家接下来在创作三部曲的后两部《北征》《入浙》时，能扬长避短，将软硬兼施、虚实相生的艺术追求实现得更为圆满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）

得者乔叶说：“我特别喜欢北京的烟火气、市井气。我觉得所有大主题最后都要落到具体的人和事上，小的事情会引发我的创作冲动。所谓新北京、新生活，是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生活，新中有旧，旧中有新，互相映衬，交相辉映。那些特别鲜活生动的东西，是我要落到笔下的内容。”

青年作家周婉京最近在琢磨一张1936年的北京老地图，她把这张地图带到了活动现场。周婉京说：“我特别想看看以前那个有城墙的北京，于是我开始在故事里写当时的胡同。我很愿意写胡同，因为胡同充满烟火气。我常常在想，旧的北京和新的北

京中间一定有一条隧道，我想变成这条隧道。”

青年作家杜梨在颐和园工作过3年，积累了很多一手生活经验。从游泳的大爷到逃票的游客，从挂假鸟的“蓝天先生”到晨跑的刑满释放人员，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。“这3年使我感受到北京生活中的新现实，这些都是宝贵的写作资源。”

活动最后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总结道：“‘新’应该是每位作家内心对自己的要求，我们要在观察视角、题材内容、写作状态上不断突破，这也是我对活动主题中‘新’字的理解。”

近日，由中国作协主办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暨《人民艺术家·王蒙创作70年全稿》发布会在京举行，位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“新中国文学的‘金线’与‘瓔珞’——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”同期向公众开放。

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上，到场嘉宾共同回顾了王蒙的生活与创作往事，向他坚守人民立场、以澎湃激情不断为人民奉献佳作表达了敬意，并在王蒙从事文学创作70年之际为他送上美好祝福。

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张宏森表示，王蒙始终与时代同进步，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。他14岁入党，是迎着共和国的曙光成长起来的作家。1953年，王蒙开始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文学创作。从《青春万岁》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《蝴蝶》《布礼》《夜的眼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，再到“季节”系列长篇小说，直到新时代以来《笑的风》《霞满天》等，王蒙始终敏锐捕捉时代脉搏，自觉肩负文学使命，他的书写展现7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，涵盖了新中国各个时期、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内容。

王蒙在座谈会上对大家表示真诚的感谢，他感恩70年创作生涯中来自党的关怀，来自亲朋好友的温暖，来自生活与文学的恩赐。“从各方面来讲，我实在是个很幸运的人。”王蒙说。

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人民艺术家·王蒙创作70年全稿》在活动现场首发，该书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王蒙作品，总字数逾2000万字，分8辑61卷，包括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读书记、创作论、《红楼梦》及诸子经典研读、人生社会、演讲对话等，未卷为附录，整理编撰了“王蒙文学年表”“王蒙著作要目”“王蒙研究论文要目”等重要资料。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鄂书林认为，这样的时间跨度、体量和质量，在当代作家中可谓罕见。

同期开展的“新中国文学的

王蒙文学创作七十年座谈会举行——
『金线与瓔珞』织就文学常青树
曹语千

“金线”与“瓔珞”——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分为“青春万岁”“这边风景”“春之声”“活动变人形”“笑的风”5部分，分别呈现《青春万岁》不同版本和王蒙朗诵视频，新疆题材作品和手稿，王蒙在改革开放后创作的《蝴蝶》《布礼》《夜的眼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经典人物形象和王蒙对老庄、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成果等，生动鲜活地再现了王蒙硕果累累的创作生涯。展览中除了富有年代气息的旧书报、手稿、影像等，还有“人生即燃烧”王蒙创作金句墙，供大家打卡留念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，王蒙用作品勾勒出一条贯穿当代文学史的“金线”，伴随着经久不衰的创作激情熠熠闪光。2019年，王蒙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，为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。



“新中国文学的‘金线’与‘瓔珞’——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”展厅一角。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

《化蝶》：为老戏赋新曲

本报（董世捷）近日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“戏里戏外照亮人生——哲贵《化蝶》新书分享会”在杭州举行，该书以信河街越剧团新团长、小生刘敬改编经典剧目《梁祝》为主线，探讨与传统、与他人、与自我的关系。

继《仙境》后，哲贵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越剧，以越剧团老戏新排为头，带领读者走进传统戏曲艺术世界。从“草桥结拜”的“离故乡，别双亲，求学上杭州”，到“十八里相送”的“相依相伴送下山，又向钱塘走上”，再到“山伯临终”的“生前不能夫妻配，死后也要成双对”……作家既是在对演员的排演过程进行全方位呈现，也是在为读者细致入微地“讲戏”。小说中，作家这样解释团长刘敬改编《梁祝》的目的：“让这个戏现代起来，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。就这么简单。”而《化蝶》这本小说，也可视作作家让年轻读者了解传统戏曲的尝试。

对演员职业身份特殊性的探讨也是《化蝶》的主题之一。对小生刘敬和花旦肖晓红而言，“舞台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，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，说不清

道不明的”。二人是舞台上相辅相成的搭档伙伴，也是生活中暗流涌动的竞争对手；是舞台表演中虚构的梁山伯和祝英台，也是现实层面上某越剧团的演员、某一位名角的徒弟、某个人的爱人。哲贵在《化蝶》后记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更感兴趣的，是演员在处理现实生活时，舞台还在不在？他们又如何从坚硬的现实中拔身而出，变成舞台上的演员。”作家在故事讲述中，通过“卸装”和“扮装”之术，为我们还原作为戏曲演员的人与作为人的戏曲演员。



打开书写北京的多维空间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作为2023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、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，近日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“新北京，新生活，新写作”主题分享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办。多位作家从生活感受出发，讲述北京日常生活给自己的独特感受以及由此激发的创作灵感，畅想北京书写的丰富可能。

主持人晓涛表示，如何书写新

北京、新生活，是每个北京作家都要面临的问题。“北京不只有通衢大道、宏伟建筑、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有雍容大气的城市性格。在时代的大背景下，城市的无限生长性中，我们经常能遇到好故事，如何把我们的生活感受和用鲜活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来，对于北京作家来说，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”

北京作协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获